徐渠个展：复活

策展人：孙冬冬
展　期：2021.3.13 - 4.30
地　点：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二空间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下午 4 点，在北京第二空间推出徐渠个展“复活”，由孙冬冬担任策展人。

此次展览呈现了徐渠 2020 至 2021 年全新系列“复活”，包含绘画和装置近二十件。徐渠此前在唐人香港空间举办的个展“直线”也刚于 2 月结束。从复活节岛上著名的巨型人像图腾群“Moai”，到西方文明思辨的精神人物塑像，再到北京世界公园中微缩景观的政治性想象，徐渠从遥远的地理尺度与咫尺的流通领域中，唤醒了形象的辩证和复活的可能。

复 活

孙冬冬

I

1722 年的 4 月 5 日，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支太平洋探险舰队，在南太平洋上“发现”了一座与美洲大陆相隔遥远的小岛，登岛之日正值基督教复活节的第一天，因此这支探险舰队的舰长雅克布·罗赫芬将其命名为“复活节岛”，意为“我主复活了的土地”。事实上，正如我们知道的，彼时这座岛并非是一座没有文明的荒岛，岛上除了有数千人的原住民，还有历代原住民为自己信仰所竖立的近千座巨型石人雕像。这些巨型石像在原住民那里被称作：Moai（摩艾），而这座小岛也有一个属于原住民自己的命名：Rapa Nui（拉帕-努依），直译为“地球的肚脐”。

由此可见，18 世纪雅克布·罗赫芬口中的“复活”，沿袭了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者的思想谱系，就如他的欧洲探险家前辈一样，通过地理大发现伴随的“文明”大发现，在文明与野蛮的话语政治中，将文明从空间（地理）差异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实际指向的是对自身文明优越感的确认。亦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表述的，“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欧洲国际法始终主张，基督教民族不仅创造了一套适用于整个地球的秩序，而且还代表此秩序。……文明除了指欧洲文明之外，别无他指。在这个含义上，欧洲俨然是世界的中心”。

如果说，原有的“地球的肚脐”指涉的是这座岛在地球球面上的地理位置，那么后来的“复活节岛”，则代表了欧洲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而这里所说的“创造”，等同于施密特欧洲国际法的轴心概念“nomos”——当代学者刘禾将它翻译成“规治”。“nomos”是一个希腊语的名词，包含了三重含义：首先是取得与占有土地；其二是将取得的土地进行分割和分配；其三是放牧，也就是对分割到的土地进行开发、管理和使用。施密特在重新诠释“nomos”时，并没有讳言欧洲列强瓜分、侵占全球殖民地的历史，在他称之为“空间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对异教徒的暴力、屠杀与掠夺，以及欧洲诸国之间为了争夺利益的血腥战争。然而，作为法学家的施密特言说“nomos”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批判欧洲的殖民历史所带来的压迫与死亡，就像刘禾指出的，施密特的“nomos”之所以被翻译成“规治”，是因为施密特的国际法始终强调政治和统治手段是根本，法律从属于政治和统治的需要，而国际法在欧洲启蒙主义之后产生，也正对应于欧洲资本主义当时加速全球规治的技术性需要。

耐人寻味的是，施密特是在 1942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阐述上述思想的，我们知道，当时全球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施密特对此却并未谈及，只在末章的只言片语，借用他人的口吻，以极其隐晦的方式提到世界正在经历的毁灭与混乱。不仅如此，在面对当时的世界图景，施密特表现出某种“积极”的政治态度，因为依据他对地理大发现以来地缘政治的研究，眼前的混乱终究会回到一种新的全球规治之中。由此，我们或许会马上想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及我们在 21 世纪的今天身处的全球化危机。

II

像许多人一样，艺术家徐渠没有到过“复活节岛”，但也和徐渠一样，对于“复活节岛”我们又似乎并不陌生。这种不陌生感，其实与我们是否到过那里没什么关系，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曾提出，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复活节岛”之所以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Moai”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化身成为一种充满神秘感的文化符号，当然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与这个包含了西方节日的岛名有关。虽然，今天的人类学家普遍使用“Rapa Nui”指称这座小岛，但“复活节岛”的名声与形象，已经与现代旅游的符号经济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

与世隔绝、遥远、神秘——一些去过“复活节岛”的游客，在旅游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反讽的是，也许同一位游客还会评价当地的酒店、餐厅与酒吧等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两者的交集与之间的偏差，恰好落实了徐渠作为艺术家对于“Moai”形象的兴趣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徐渠同样是在一种旅游情境中“发现”了“复活节岛”，在这里——北京世界公园——一座容纳世界五大洲名胜古迹的缩微景观的特色公园中，“世界”的形象如同化石一般呈现在游客的眼前，而这座公园动工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时刻：1992 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1992 年发生的邓小平“南巡”已经被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分水岭事件，此后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并逐渐以世界级加工厂的身份融入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2001 年加入“世贸”与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都成为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在徐渠看来，北京世界公园所显现出的“世界性”，既包含了一种全球性的世界观，同时由江泽民题写的园名，又赋予这座公园一种政治性的想象，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它是一个提前到来的世界，像一个时代预言，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个成真的预言所对应的后全球化时代，又在反向提示边界与距离的意义——世界公园里的景观地标，如同一个个划定疆域的界碑。而徐渠从中选择了“Moai”的形象，在遥远的地理尺度与咫尺的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中，发现了形象复活的可能。

复活，总是与死亡和生命相关的，而徐渠《复活》再制的 Moai 形象是一种空间祛魅后的时间叙事。当等待回炉的报废汽车体块与文明终止的遗迹符号遭遇时，原本属于能量、行动以及功绩的空间力场，被强大外力挤压折叠之后，转而成为禁锢生命世界的褶皱。这是一个收缩成殊相的世界，一个在历史空间不断汇集的集合体，它既可以抽象为一个“赤裸生命”的概念，也可以具身于一个个生活世界中：从之前被西方殖民的原住民到如今欧洲四处蔓延的难民，从“铁锈带”的美国工人到为全球提供廉价商品而三班倒的中国工人，从被算法考核逼迫的外卖小哥到互联网上信息茧房中的孤立者……。悖论的是，一边是境遇相似的劳动力市场，另一边在全球化普世主义许诺失败后，国家推卸或者转移世界性困境责任的方式，又重回到“我们”与“他们”相互对立的阵营——附着在 Moai 形象上的历史幽灵再一次被唤醒，或许它一直潜藏在所谓规治秩序之中，只是在新旧秩序更替时显现出来。

历史在悲剧与笑剧之间反复的切换，人类的命运在整体性与身份认同之间逡巡徘徊，就像徐渠画作《尘埃》与装置《水滴》之间形成的视角关系，从宇宙的宏观角度观看，地球生命如尘埃一般平等，可一旦转入地上空间的尺度，生存现实之间的对抗与交锋又以主权边界为前提——如果世界的种种矛盾都可以被化约成“对立和谐”的辩证形象，诚如徐渠装置《仪式》所呈现的一样，那么这个抽象的形式只能存在于某个至高无上智慧者的脑中。于是，我们又回到了 Moai 形象的原初，一种为信仰所树立的雕像。当徐渠重新描绘这些形象时，作为人的形象已经成为白骨，如果从雕像与心理基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一体两面的修辞，既可以被解读为对传统精神的召魂，又可以像尼采所言的，“要立起一座圣殿，就得毁掉一座圣殿：这就是法则……”所做的破土安魂，记忆与失忆被吊诡的融合在了一起。如此看来，作为展览的“复活”，集合了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与动荡，它更接近于一种历史的形象，本雅明将其比喻为历史的天使，背对未来被推向“神秘的未知之境”，面前成堆的残骸伸向天空。

艺术家

徐渠，1978 年生于中国江苏省，在布伦瑞克艺术大学攻读艺术与电影专业，2008 年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现在中国北京生活工作。

从泰康空间的《51m2 11#》到《西沙-海牧场 1#》项目再到《逆水行舟》，在徐渠的艺术实践中，总是借助直接的运动来讨论社会关系背后的美学考量。不过后期，尽管他沿袭了前期的直接运动，却尝试着摆脱偏离主题的的非必要元素，以极简理念对画面加以简化处理。艺术家将检视人类美学的终极目标，探讨不同美学体验融合冲撞过冲中浮现的价值观及思考，追踪我们前进的不同方向，视为自身创作的终极目标。

徐渠近年期举办的部分个展包括：“直线”（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香港，2021）；“旷野”（亚纪画廊，台北，2020）；“混沌”（MDC 画廊，米兰，2019）；“疼痛”（天线空间，上海，2018）；“教义”（天线空间，上海，2016）；“货币战争”（Almine Rech 画廊，布鲁塞尔，2015）；“友谊万岁万万岁”（天线空间，上海，2015），“瞬间”（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2014），“网球场”（泰康空间，北京，2014）；“可变的形式和不可变的意识”（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曼谷，2013）等。

他的作品也先后展出于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艺术中心，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上海 OCAT 上海馆，上海 chi K11 美术馆， 北京金杜艺术中心，深圳 OCAT，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武汉剩余空间，台北亚洲艺术中心，第三届乌拉尔当代艺术工业双年展等诸多项目及群展中。

策展人

孙冬冬，策展人与艺术评论人。生于江苏南京，硕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系。曾担任《艺术界｜LEAP》杂志资深编辑，负责学术专题策划与展览评论，并为 UCCA、广东时代美术馆、成都 A4 美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策划主题展览。现工作与居住在北京。